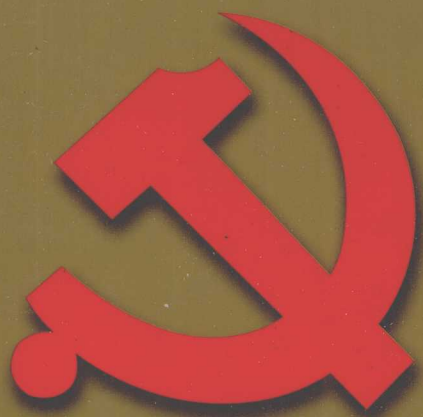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张静如 主编
王炳林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张静如 主编
王炳林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ocated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cover, below the publisher's nam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张静如、王炳林主编. —青岛:青岛出版社
ISBN 978-7-5436-4983-5

I. 十... II. ①张... ②王... III. 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1978—2008
IV. D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3110 号

书 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主 编 张静如 王炳林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李忠东 电话 (0532)85816241
封面设计 申 尧 程 皓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87mm×1092mm)
印 张 32.25
插 页 6
字 数 6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4983-5
定价(精) 68.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建议陈列类别:社科类、中共党史类

全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重点图书

序

张静如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我在1991年出版的由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导论中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是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然后，我又分析指出它包括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左”的和右的错误指导思想。根据这个说法，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就是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史。现在看来，这样说，似乎窄了些。当然，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主体，这是因为它影响着全局，决定着发展方向。但是，如果仅限于考察主线，那就把事物的复杂性简单化了。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一方面来自实际的要求。这实际既包括国情、现实状况，也包括全党的思想认识。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正确指导思想的形成，不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情和现实状况的结果，而且也要以全党的思想认识为基础。后者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党内诸多思想家的思想、观点、主张；一是普通党员群体的思想认识。这样，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就应该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党内思想家们的思想、观点、主张发展的历史进程；普通党员群体的思想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领导核心的思想家、理论家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各种理论研究的专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分别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提出过许多有益的独到的观点、见解、主张，或对中共中央指导思想及相应决策的形成起着奠

基作用,或对中共中央指导思想及相应决策的贯彻起着解释、宣传的作用。所以,研究党内思想家的思想、观点、主张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同样,研究普通党员群体的思想认识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指的思想认识不是一般愿望、要求之类的心理状态,而是在各类实践活动中对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概括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些共性的观点、主张。这些群体性的观点、主张蕴涵着诸多真知灼见,对于中共中央指导思想及相应决策的形成和贯彻的作用不容忽视。

上面的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但本书仍主要叙述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为什么知道又不去做,理由很简单,没有研究。不仅我们没有研究,学术界都没有研究。如果说对改革开放以来部分理论界提出的观点、主张有过零散研究的话,那么对普通党员群体的思想认识就根本没有研究。本书只能采纳已有研究的党内一般思想家的成果,并略加补充,以作为叙述和分析中共中央指导思想的陪衬,至于普通党员群体的思想认识则没有能力如实反映。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指导思想发展史的叙述和分析,本书虽有不足之处,但基本上还是说明白了,希望听到读者的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研究。这里只说点有关的想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有了巨大发展,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对此,虽然有些人不以为然,但绝大多数人是认可的,是赞同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而且我们一定能够坚持走下去。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且不说完全否定这一体系的议论,就是在认同这一体系的人中,也有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那么理解,觉得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不能成为指导思想。我以为这样看不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最新概括。这个核心理论所解决和回答的问

题有三,即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关于个人和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准确地、精练地概括了这3个方面,因此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指针和推动力。比如: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说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特别是社会意识的作用,否则就无法弄清楚社会为什么能够发展和向什么方向发展。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即是说社会意识可以促进或延缓、阻碍社会的发展。文化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它同样可以促进并引导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延缓、阻碍社会发展或引导社会向不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样,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了。它是社会进步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是社会团结和凝聚的旗帜和灵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语道破了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精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3个方面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前,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对于这3个方面虽然都有过深刻的论述,但却没有作出过如此集中而简练的一体化综合概括。这种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精髓突出出来了,明确了其重点之所在,并具有易懂、易记、易掌握的优点。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括、总结的过程来看,它不是一般理论层次上的观点,而是根本性、全局性的最高层次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提出来的。既然如此,它就不可能是阶段性理论,而是普遍性、宏观性和恒久性的理论。许多一般理论层次上的极其重要的观点、方针、政策,诸如依法治国、一国两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都不能作为全局性的指导思想,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因其是处于能够统领全局层次的理论,才被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就是要谋求中国社会的不停顿发展,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什么是发展呢?发展是一种“前进性变化”,是突破、改变事物原有状态而向更高层次前进的变化。要促进这种变化,必须

借助于思想解放,因为思想解放具有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束缚的能力;因为思想解放才能察觉出事物原有状态中的问题,认识到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为研究和解决问题提供基础。由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解放思想要时刻进行,使之处于不间断状态。也就是说,对各个领域具体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研究、及时解决,以促进发展。当然,就全国来说,解放思想不可能永远处于高潮状态。由于要突破、改变事物的原有状态,解放思想必然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阻挠。所以,愿意促进事物前进性变化者,一定要敢于解放思想;要勇于坚持,不怕打击,不怕讥讽。要突破、改变事物的原有状态,靠空喊解放思想是不行的,必须落到实处,落到解决实际问题上。当然,必要时造一造声势也不为过,但终究要以实际问题为目的。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事。只有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去做,才能使整个中国社会快速、稳定、健康发展。对个人来说,努力做是多方面的,其中学习、了解、掌握中共中央指导思想并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非常重要。本书所叙述和分析的中共中央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是辅助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材料,是理解中共中央指导思想的途径之一。如果我们所作的努力能够对读者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有一些帮助的话,那么也算是我们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点贡献。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也谨以此书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

是为序。

目 录

序	张静如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
一、思想大解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
二、伟大的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4]
三、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完成——《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颁布	[27]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	[33]
一、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	[33]
二、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	[38]
三、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与重申	[48]
四、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崭新命题	[52]
第三章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思想	[58]
一、改革实践推动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重新认识	[58]
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	[63]
三、中共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68]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74]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主义民主 制度化、法律化思想	[74]
二、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思想	[84]
三、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96]
四、中共十三大及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106]

第五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	[116]
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渊源与现实根据	[116]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21]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	[135]
第六章 “一国两制”构想	[149]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确立	[149]
二、“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	[162]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	[176]
第七章 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182]
一、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	[182]
二、时代主题新判断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195]
第八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206]
一、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再认识的探索	[206]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重大意义	[212]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逐步提出和完整概括	[216]
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221]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224]
第九章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233]
一、新时期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	[233]
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	[239]
三、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49]
第十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	[255]
一、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初步探索	[255]
二、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深入思考	[260]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逐步完善	[265]
第十一章 邓小平理论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272]
一、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272]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277]
三、研究和宣传工作在邓小平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282]
四、邓小平理论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285]
第十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	[29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形成和完善过程	[29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内涵	[29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重要意义	[311]
第十三章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思想	[314]
一、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	[314]
二、“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构想	[320]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324]
第十四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28]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328]
二、“三个代表”理论体系的日臻成熟	[338]
三、“三个代表”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343]
第十五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	[347]
一、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设计和小康目标的提出	[347]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	[353]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重要举措	[355]
第十六章 科学发展观	[361]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	[361]
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365]
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	[373]
四、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意义	[379]
第十七章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思想	[395]
一、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395]
二、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性建设	[399]

三、先进性建设思想是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410]
第十八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	[424]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	[424]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434]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440]
第十九章 实现祖国统一思想的新发展	[449]
一、处理两岸问题的新构想	[449]
二、新形势下祖国完全统一的新思路	[461]
第二十章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思想	[475]
一、和平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	[475]
二、和平发展道路思想提出的依据	[482]
三、“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490]
四、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	[496]
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	[49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499]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50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意义	[505]
后 记	[508]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的重新确立

1978年,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已经从动乱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彻底纠正已经延续了20余年的“左”倾错误,把拨乱反正由局部扩展到全面,从而实现历史性的转折,还是继续维护“左”倾错误,在“左”的迷误中继续徘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

一、思想大解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历史的发展呼唤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在全党、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潮流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为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进行的艰巨斗争中,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神州大地。这是一场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大大解放了人们被禁锢已久的思想,使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一)“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其危害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是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还是继续迷恋“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成为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尽快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历史冤案平反,尽快恢复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老干部的工作,而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却因为这些案件的处理是毛泽东生前所决定的,迟迟不给予平反和纠正。

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一再要求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还要求“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1976年10月18日,中央在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中传达了华国锋的这些意见。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

负责宣传方面的有关领导的汇报后明确指示：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对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根据这一指示，《人民日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个月内还4次出现了批邓的版面。

11月18日，汪东兴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他态度坚决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办“四人帮”搞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炮制的样板戏。他坚持说这都是毛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11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讲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毫不隐讳地指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样做是分裂中央。他提出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周年前后，全国人民又一次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更加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表达这种要求的大标语。有的单位还将1976年四五运动中流传的诗词搜集起来，编辑成册。在这种呼声中，也有一些标语表示了对某些压制人民群众正当要求的中央领导人的不满情绪。

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华国锋一方面同意有步骤地解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

1977年初，中央准备召开工作会议。1月，华国锋将他在1976年10月对中央宣传口的指示精神写进了为他准备的会议讲话稿中，于是在1月21日写成的讲话提纲中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地制止，不能容忍。”由于会议推迟召开，华国锋同意先将此精神写进《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以作宣传。于是，2月7日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样，“两个凡是”被正式提出。

3月10—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在起草会议报告时，他没有采纳叶剑英提出的要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便让其快一点出来工作以及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会前，他还特意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时再次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定，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根据这

学好文件抓住纲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和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发表以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衷心拥护,广泛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当前,各地党委更加领导,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进一步把两个重要文件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执行好,在两个重要文件的指导下,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揪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开展起来。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批斗“四人帮”,这是我们从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中提出的。

毛主席说:“一句古语,‘纲举目张’。要领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明确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在批斗文斗一定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能含糊不清。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突破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按照这个决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强大起来,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不要忘记这个战略。为了防备对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必须在国际这个战略去。而要实现这个战略决策,就

“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定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

步调一致,必须认识一致。因此,要首先认真学习好两个重要文件。各机关、各团体、各企业、各事业单位,都要认真学习好,真正吃透文件的精神,看谁领会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和毛主席讲话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同时,还应当亲自宣讲两个重要文件和中央其他有关文件,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组织领导好,用两个重要文件的精神来武装大家的头脑,统一大家的认识。

学好文件是为了指导实际斗争。各级党委都要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用极大的力量,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揪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好。一定要深刻懂得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懂得搞好这场斗争对全局的影响,使自己对这场斗争的理解和领导,能够适应斗争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真正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到斗争的最前列,带领群众把运动搞得彻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一定要把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有周密的部署和计划,有切实的措施和办法,有经常的督促和检查,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深入基层,抓点带面。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根据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观点和两条道路的学说为指导,及时了解群众和社会上的政治思想情况,经常研究政治思想动向,加强宣传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有针对、有说服力地向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人们思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样,就能掌握领导运动的主

行动。只要我们各条战线揪批“四人帮”的运动进一步有力地领导起来,围绕这个中心,把党内和群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抓好,把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抓紧抓好,有什么困难,把情况告诉群众,同群众一起想办法去战胜困难,不断地用揪批“四人帮”的新战果,用生产和工作上的新成绩,用克敌制胜的新战果,去鼓舞群众的斗志。我们一定能巩固和发展四个月来的大好形势,更好地去完成毛主席讲话中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各项战斗任务。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高地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毛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继续进行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

样的原则,他对在党内和群众中反映强烈的邓小平复职和天安门事件问题定出如下基调: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中央决定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认为:1976年4月,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同时又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还指出: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甚至公开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华国锋的这番讲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党内外大多数人的要求,即表示同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承认1976年4月清明节期间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行动“合乎情理”,这同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初的态度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他同时又坚持以“两个凡是”为前提,认为既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维护“文

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所有决策,就不能改变1976年中央对这两件事情的错误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局势。这样一来,不仅使他在这两个问题的说法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地步,而且使广大干部群众仍不能满意他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的解释。

“两个凡是”的提出和推行,延缓和阻碍了“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平反。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急切盼望尽快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本应因势利导,通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把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然而“两个凡是”思想的提出却使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极大困难。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同时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这就给平反冤假错案设置了种种障碍和禁区,使这项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只能搁浅在一般性的“落实政策”层面上,从而延缓和阻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到1977年底,中央和国家机关的53个单位中仍有6241名干部等待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全国尚有十几万名“右派”没有摘帽。“两个凡是”的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反对实事求是;在实践上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严重阻碍着拨乱反正的进行,窒息着国家和民族的生机。因此,不推倒“两个凡是”,党的思想路线不端正,就不可能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混乱,共和国就不可能摆脱困境、打开新局面。

(二)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

在“两个凡是”阴影的笼罩下,人们充满期待的眼睛再次布满了愁云。然而,此时实践标准的酝酿正在进行。

邓小平最先向“两个凡是”发起了反击。早在1977年4月10日,他就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着重地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①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成为我国解放思想的先声,成为我国思想战线拨乱反正的先导。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9页,人民出版社,1994。

7月16—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①他还进一步强调：“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②很明显，邓小平刚一复出，就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意在抵制“两个凡是”的影响。

8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其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围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两个凡是”的“左”倾思想进一步系统化。针对这些“左”的错误，邓小平在大会闭幕词中又着重强调了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的问题。

在反对“两个凡是”方面，邓小平首先推倒的是过去长时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工作的错误估计。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肯定：建国后17年的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他还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③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还针对在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方面作出错误估计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纪要》明确指出：《纪要》是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但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④邓小平的上述言论，推倒了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也打开了“两个凡是”的一道缺口。

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方针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人也公开发表文章，畅谈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

①②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45、49～51、66～67页，人民出版社，1994。